



·数风流人物·



胡福明(资料照片)

在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，收藏着《光明日报》刊登的、引发全国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刊行稿。此外，这里还保存着该文章的最初排版稿、修改稿、作者胡福明与编辑之间的通信等，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文章出炉的过程。

胡福明，出生于1935年7月，江苏无锡人，荣获“改革先锋”“最美奋斗者”等称号。

1976年秋天，“四人帮”倒台，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做教师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起，以喝酒吃蟹的方式来庆贺。然而，

胡福明：

实践出真知

1977年2月7日，“两报一刊”的社论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。“这等于给揭批‘四人帮’的热潮泼了一盆凉水，等于回到了‘文革’老路子上去。”胡福明当时很吃惊。

但他也很快意识到，抓住了“两个凡是”，就抓住了批判“四人帮”、批判“文革”错误路线的靶子。然而，胡福明感到心里没底。1977年的三四月份，正是胡福明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。犹豫了一个多月，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的责任感最终占了上风，他暗下决心开始动笔。

1977年夏天，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。去陪护时，他把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《毛泽东选集》带到医院，在医院的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。妻子出院时，文章提纲也大致写成

了。9月初，胡福明将8000字左右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的文章，寄给了《光明日报》编辑部。

1978年1月，胡福明收到了编辑来信。后经反复共同讨论和修改，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《理论动态》上发表，5月11日《光明日报》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，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，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也于次日全文转发。

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发表后，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。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被高度评价为“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，端正思想路线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”

胡福明坦言：“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，很多哲学教师都懂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‘时间节点’把它写了出来。文章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影响，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”

20世纪80年代，胡福明调到江苏省委工作，虽然行政职务渐高，可他从未停止思考。后来，他还陆续写了《苏南乡村企业的崛起》和《苏南现代化》等著作，持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进展。

“全文6000余字，激荡40余年。这篇文章是胡老师在对马克思、恩格斯思想真懂、真信基础上，解决真问题，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。”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、教授孙乐强说，胡老师的这篇文章，及其身上体现出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定力是南京大学哲学系“惟真是求”学风的重要体现。

孙乐强表示，在胡福明等老一代学者的引领下，南京大学哲学系在马克思、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形成了两个“四位一体”：文本、思想史、理论、现实的四位一体，以及党建、教学、科研、服务的四位一体。“通过对经典理论、当代现实的理解和把握，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发展、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。”

据新华社

袁庚：

改革精神照后人



袁庚(资料照片)

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”深圳蛇口微波山下立着的这句著名口号，让人想起改革先锋袁庚。

袁庚，1917年4月23日出生，广东宝安人。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，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加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，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。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事教员、联络处主任、驻香港办事处主任，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团长。1949年后，曾任中国驻雅加达领事。

1978年，袁庚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，随后在深圳创办蛇口工业区，并进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探索，打造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区的雏形”。

“那时候的蛇口真可以说是穷乡僻壤，淡水只有两口井，经济发展硬件、软件的基础都很薄弱。”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宪回忆。

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时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等共产党员“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”，以改革创新的精神，勇于担当的作为，炸响改革开放的“开山炮”。

1979年8月，蛇口工业区首

项工程蛇口港开工。袁庚开创性地打破大锅饭，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，工人们干劲大增，工程进度迅速推进。工资奖金上不封顶、下不保底的做法，渐渐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普遍采用的重要激励机制。

正是在袁庚的大力推动下，蛇口在短短数年间启动了从打破“大锅饭”到招商引资、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等一系列重大改革。

1984年，国庆35周年庆典活动上，写着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标语的蛇口工业区彩车，亮相天安门广场。

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表示，1983年他南下深圳之初“不知道要干什么”，当听到袁庚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之后，有了创业的热情。

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回忆，如果没有“时间就是金钱、效率就是生命”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国首推的改革举措，当年的深圳断然不会产生招行、平安、华为、万科等一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。

在梁宪看来，这些企业之所以成功，“关键在于它们从一开始便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。”

蛇口工业区的探索起步，揭开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序幕。

40多年来，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.7亿元增至2020年的2.77万亿元，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。

在盘点了全球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之后，英国《经济学人》用“若干成功典范中最突出的一个”来形容深圳。

晚年的袁庚，常常请司机带着他在蛇口港区、赤湾港区和妈湾港区沿路看下去，带着欣喜和满足。

2016年1月31日，袁庚因病逝世，享年99岁。2018年，袁庚荣获“改革先锋”称号；2019年，荣获“最美奋斗者”荣誉称号。

据新华社

谢高华：

顺民意开放义乌市场



谢高华(资料照片)

正在浙江巡演的婺剧现代戏《义乌高华》受到观众热捧。剧中主人公的原型谢高华曾任改革开放初期的义乌县委书记，他坚持群众需求就是第一导向，冒着丢官的风险，打破条条框框，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“开绿灯”，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。他2018年荣获“改革先锋”称号，2019年荣获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。

谢高华，1931年出生，浙江衢州人。1982年5月至1984年12月期间任义乌县委书记。

当时的义乌是“一条马路七盏灯，一个喇叭响全城”的贫困县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各种副业，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。

当地一些部门因上级对能不能搞商品市场还没有明确定论，仍把这些路边摊市场视为“投机倒把，走资本主义道路”进行打击。

1982年6月的一天，在县城摆摊经常被有关部门“围堵”的农妇冯爱情，在县机关大院外拦住了谢高华，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老百姓摆地摊。当时，谢高华到任义乌才一个多月，冯爱情的话让他深受触动。

谢高华开始对义乌群众摆地摊等经商情况进行调研，又带队到温州考察，越调研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的精神原则，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。

在当时历史环境下，要市场松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当地不少干部怕担责任，

顾虑重重。对此，谢高华在一次县机关大会上明确表态：“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！”

1982年9月5日，义乌县委作出决定，开放稠城镇湖清门小商品市场。一时间，周边县市被“围堵”的摆摊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义乌。

在此基础上，义乌县委、县政府又发出“四个允许”通告：允许农民经商，允许农民进城，允许长途贩运，允许多渠道竞争，进一步为城乡经济松绑。

1984年，谢高华结合义乌实际首创“兴商建县”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，带领全县干部勇敢坚持、积极作为、精心培育，从而催生了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，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。

谢高华曾坦言：“当时，只想对老百姓有益就好，要打破条条框框，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开创的良好营商环境，是义乌成功的一大秘诀。”谢高华曾经的同事、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守春说，谢高华眼里只有工作，工作特点就是吃透上头精神实质，潜心研究当地实际，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指示，干出地方特色。“他用白天80%以上的时间跑基层，用每晚近5个小时的时间在办公室吸收消化各种信息，笔记本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备注。”

“谢高华对自己高标准、严要求。作为开创义乌市场的功臣，他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，没有一间商铺，也未持有任何义乌企业的股票。”杨守春回忆说。

《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》一书的作者之一何建农说，“要致富，到义乌”成了当时各地供销人员的口头禅。谢高华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，激励着后来义乌历届班子接力探索、赓续奋斗，成就了今天的义乌市场。

1995年，谢高华在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。富裕起来的义乌百姓也从未忘记他，从1995年起，每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，众多市民自发组成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出口处，举着横幅、手摇拨浪鼓欢迎谢书记“回家”，以此表达感激之情。

“飞鸡毛引银练无愧先锋，生于斯长于斯情系金衢”。2019年10月23日，谢高华因病抢救无效，在杭州逝世，享年88岁。灵堂现场，这副挽联概括了谢高华的一生。

据新华社